

序 言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

文明的建立基于能激励男人和女人灵魂的神话与圣哲。神话往往是围绕圣哲或精神领袖而形成的，比如佛陀、老子、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基督、穆罕默德等等。

当然，不同时代对神话和圣哲有着不同的阐述，而每一时代又创造着新的神话和圣哲。在本世纪，围绕约翰·凯恩斯和毛泽东创造了许多奇特的神话——至少当时是如此——作为一种永恒的手段用以促使社会组织为其人民服务。

当今，现代化的通讯系统使信息传递迅速快捷，使国界失去意义，人们津津乐道“地球村”的形成。然而，人们却容易忽视神话和圣哲持久的重要性，是它们为重要的文明传统提供并增强了凝聚力。

实际上，许多人都不曾注意到，由于不被重视，我们的“地球村”被认为颇像“海市蜃楼”式的幻想，因而西方

一些评论家一直对于那些给欧洲以外的文明带来凝聚力的神话和圣哲，采取轻率的态度，不从学术上予以注意。

由日本促动、但主要由于有着一批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北亚国家的经济活力，使得这种轻率态度成为西方国家衰弱的主要原因，他们越来越发现自己无论在经济上或体制上，都无法与北亚国家那种蓬勃朝气相匹敌。

本书的目的是想阐述在过去几百年独一无二地激励北亚各国的神话和圣哲，在 19 和 20 世纪面对西方对其正确性的挑战之后，正在复兴起来，这种复兴——也许就是儒学的复兴——表明，它可能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引导世界走向 21 世纪。

在赫尔曼·卡恩的一些著作中，以及霍夫海因茨及卡尔德 1982 年在美国出版的名著《东亚的锋芒》，以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首先向全世界警示北亚所发生的一切。《东亚的锋芒》一书中说，“现在他们的锋芒已指向我们，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的思路和我们不同。”书中指出北亚国家的政府是人治政府，而非法治政府，他们也有法律制度，但北亚国家的法律传统是建立在所谓“人际关系”上的。书中指出：

孔子提倡五伦——朋友之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父子之间及君臣之间——并坚持这是人伦与社会秩序的基础。

《东亚的锋芒》对西方一些国家产生了影响，这批西方国家是最早了解北亚的发展的。遗憾的是，它对西方

有关国际发展的思想主流影响有限。不过，霍夫海因茨和卡尔德所指出现象在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现象，就像五百年前那次伟大的文艺复兴，欧洲新的活力喷涌而出，影响着整个世界，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这里指出一点是重要的，即作为北亚主要精神传统的儒学，展现出其独一无二、其他传统少有的优秀素质，在这方面，包括佛教、道教、日本的神道，甚至天主教，都无法与之相比拟。北亚古老的神话和圣哲，看来更可能替代西方文化成为我们“地球村”未来的中心。

我们都靠神话而生存。神话是精神和理性信仰所构成，这种信仰对一个未知的和无法预言的世界赋予意义，予以肯定。

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经济分析的价值是今日人类最强大和最可信赖的神话，两者都曾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物，两者也应该是儒学复兴早期最广泛的象征，它不在于出现另一个达·芬奇，而是普及于千家万户的半导体收音机和电讯传真机。

然而，如果不承认并探求产生那些灵巧实用的科技器材背后的文化及文明力量，不承认并探求那些把人类带入一个巨大、艰难而带有挑战性的时代转变背后的神话，那将是悲剧性的错误。

第 一 章

孔子思想是世界的中心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
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大学》

神话和圣哲辈出的时期

公元前 500 年间，直到耶稣圣灵感孕诞生，新事物接踵而出，当时的许多神话和圣哲至今仍引导着世界文明。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其他许多希腊思想家；罗马帝国的缔造者们，许许多多希伯来先知，波斯国教创始人左罗阿斯脱，佛陀，以及中国的许多先哲，他们生活和工作在世界各地，是他们在那个不是很长的历史时期，奠定了后来世界的精神和哲学基础。

在西方，注意的中心集中在希腊人、罗马人和希伯来人身上；而在东方，也许是一个更富创造性的时期，但只是到了后来，世界的这一部分涌现的辉煌成就，才使

得有着各种不同文化和文明传统的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密切地注视从中国历史或说从儒教传统孕育、成长的种种神话和诸多圣哲。

儒家的神话和圣哲

北亚文明传统中最重要的人物，毫无疑问是孔子，他是 2500 年前闻名的春秋时期的一位周游各国的学者、哲学家和教师，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诸子百家争鸣的初期。如同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一样，这一时期政治上的不稳定和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使社会生活充实，给人们提供丰富的经验，并利用这种经验去培养、去考验、去促成决定人们命运的客观力量。

这一时期的中国并不统一，诸侯林立，内忧外患。孔子可能出身于较低微的贵族阶级，他以谦恭的态度、坚定的信心，精力充沛地周游列国，希望找到一位值得辅佐的国君，展示自己解决安邦定国这一具有时代重大政治问题的谋略。作为一位积极的政治家，他也许是个失败者，但他百折不挠，转而面向年轻人，教育年轻一代，为他们未来治国平天下作准备。

作为一位导师，他的热忱和成功并未立即获得他所期望的结果。然而，到公元前 2 世纪末，儒学得以确立，儒学作为国家正式的学派得到承认。他既不强调实用主义，也不崇尚神灵。他竭力提倡的是道德，是学习，是能保证人与自然规律和谐的礼，即一种道德守则。他坚

信，通过对过去风俗、习惯、传统以及文学的研究，人们能够理会“天意”，最终得以天遂人愿。

奇怪的是，在公元前 221—207 年的秦朝，中国首次成为统一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采取严酷统治的时期。它崇尚的是法，强调法令高于一切，因而就必须在必行使权力时理解法，要儆戒，要明智。

当然，确立孔子声望的神话，今天看来主要是孔子死后中国漫长历史所积聚的丰富成果，而这些要归功于孔子或他大量的学术成果，这些形成一股强劲的哲学、社会和政治力量，在过去的 2000 多年推动中国的历史车轮前进。

同时，这些著作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哲学在中国文明传统中，不仅影响着知识阶层的生活，也影响普通人民的生活，而这在别的文明中是少见的。

从这些著作中可以找到儒家文明独具的一些特色，其中包括：

（一）尚古。孔子强化人们对属于中华文明核心的、古代贤哲的敬重和服从，使其合法化；他把古代传说中的圣贤当作自己的理想人物。同西方一些评论家的批评相反，这不是僵化，恰恰有助于坚定人们的意识，在面临需要时，能够创新，灵活适应。诸如等级制度、尊老敬贤、世袭制度，以及光宗耀祖等道德观念，都体现在孔子尚古的意识中，这形成一种模式，从而使一种积极的、有责任感的人生观得以形成。

（二）积极关心国家政权的形式和功能。孔子是世界

上伟大的先知先觉者中唯一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政权的形式和功能的重要性上的先哲，他创立了一种正当履行国家职责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中国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孔子死后的几千年，中国把大多数人民动员凝聚在一种政体中，这在世界任何别的国家是少见的，孔子的影响是使人的精力集中到为建立良好政府的道德行为上。

（三）重视教育。孔子以身作则，并在他的教学中强调教育和自我修养在为社会服务和建立良好政府中的重要性。他从事的教育有助于为加官进爵作准备的竞争激烈的教育传统的发展，这也是官僚政治的实质，这种官僚政治制度一直统治中国，并持续其历程达几千年，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闻所未闻的。

（四）宁要人治，或德治，而不要法治。孔子在《论语》中有一段名言阐述法治的主要缺点，今天在西方是难以理解的：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很早就对这两者作如此明确的阐述，以及贯穿中国历史的反反复复的儒法之争，使人们深深意识到德治和法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联想当代人们对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反思，可以提醒人们，它的所作所为靠的是一个德、法并重的政权。

（五）接受多种文化的精神和哲学权威。孔子生活在诸子百家争鸣、哲学活动十分活跃的春秋时期，这种情

况不仅在中国如此，整个世界也是这样。然而，孔子的成就在于他能容纳敌对的墨子的学说，补充老子和庄子道家学说的不足，并在面对相对立的韩非子法家学说的情况下使自己兴旺起来。佛陀也是一个颇为人们所接受的宗教传统的创建者，这一宗教传统一直受到中国儒家学派的欢迎。儒家在许多方面创立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创造了一个让各种不同的精神传统，诸如儒教、佛教、道教、天主教等等，都能共存共荣的环境。

（六）提倡并促进独特的“仁”和“礼”的概念。孔子提倡一种以仁和礼为中心、借以推动整个社会运行的社会秩序的概念。至于如何指挥这个众所周知世界最大国家结构的众多的人民，后世的理解和诠释则莫衷一是。

对立派道教的老子和庄子，也创立了中国一大精神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儒家确立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国家的关系，道教则确立“个人”与神的关系。老子和庄子的特殊学说的价值，在于在谈及人们所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时所表现的灵活态度和机智，这和孔子的学说提倡一种更为直观而较少累赘并在精神上更为纯粹的哲学，形成强烈的对比。道家书中所表现的智慧、反论和诗意，同孔子书中所表现的较为持重、严肃和正经感，正好起了一种平衡作用。

主要法家韩非子颇为严格、注重实效并反理性的著作，加上儒家、道家及孟子、墨子和庄子等其他派别的著作，很明显，百家争鸣时期大大充实了中国丰富多彩的

思想库，后来中国人就是从这一知识宝库、用这些思想武器面对人生。在许多方面，儒家思想一旦具有神话特性，成为至理名言，它就表现得最为有力，就支配着普通人民的思想意识，就显示出毫无非议的精神权威。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476 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221 年）留下了一份神话和圣哲的遗产，它加强了“中国特色”意识，激励并引导其后千家万代。它在中国形成，然后传到朝鲜和日本，后来又出现在今日发展最快的华人社会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

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 246—210 年）的统治，就是紧接着这一哲学上辉煌、知识上丰富、政治上动乱因而称为“战国时期”而出现的。秦始皇的统治时间很短，但却是中国第一次实现统一。史无前例的权力和丰富的资源由一个统一的国家掌握支配，其规模是令人敬畏的。

秦朝寿命不长，这是战乱频仍和厉行严峻措施的结果，他曾废除封建制，实现大统一，统一汉字和货币，却也因此造成它的脆弱性，很快在秦始皇死后不久，秦朝就告灭亡。

继之而起的是汉朝，它持续了大约 400 年，除了设法巩固首次由秦朝创建的国家统一，并继续阐明和应用诸子百家的学说，从而为北亚人民创建了一种卓越的精神、政治和行政管理文化。

总的说来，秦汉两代为后来中国的发展，为形成历

史上最大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奠定了广阔而稳定的基础。

中国的思想体系——谈变的书《易经》

应该说，各派哲学家的影响都是广泛的。但应特别指出中国那部独特的经典著作《易经》，或说谈变的书。西方知名的中国历史分析家之一的约瑟夫·尼德哈姆深信，中国的思想体系是以《易经》卦变之说为核心而相互关联的，这同西方强调因果关系完全不同。他把中国这种直观联系过程看作是事物本身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因此，概念并不互相包含，而是平行排列的；事物的相互影响并不需要通过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一种感应或共鸣。

在这种思维系统中，有几个重要的字：“次序”，“形式”和“结构”，某一特殊情况出现不是由于先前的动因、别的因素所刺激，而是由于自然循环规律，因此是事物具有的本能而必然产生其行为。

有些人竟说，在这里，西方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文化之间存在一条未被发觉的天然鸿沟。但这根本不能说，中国人或日本人今天就不可能掌握西方的因果逻辑。问题在于一个根本事实：西方至今很少了解不同方式的东方思想方法。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现代西方社会据以生存的许多理论基础，正在不断地并且严重地受这一中国思想体

系的影响，尽管是悄悄的；中国思想体系对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分析是根本与众不同的。看来，中国的一套，诸如次序论、等级制和集体论，比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理性论，更有价值。

当然，中国的神话、圣贤和哲学家，都不断地强化着中国这独一无二、永恒的次序论、等级制、集体论的传统。

孔子的生命观

儒学传统受《易经》的影响，它对生命的意义及等级观，同西方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可以同希腊经书相比的《易经》学说，对生活中的现实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它影响了现代西方生活。也许再没有别的东西像 20 世纪头 25 年中西方分裂原子那种研究精神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样不应贬低《易经》的伟大科学成就的价值。

美国的朝鲜社会研究专家 M. 卡尔顿曾经这样说过：

“西方个人主义的出现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有一肯定的明显的自我标榜的论点，即个人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因，并由此产生社会集团的基本单位。

“儒学的主张则不同，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不认为个人是社会复合现象的基本单位，而认为个人之间的依存关系才是社会组合的基本因素，我的生存和教养是

依靠父母，依靠家庭，依靠朋友和老师的帮助，聪明才智才得以形成，而这些全都依靠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秩序。

“这种分析认为：个体之间是有机地相互依赖，作为基本单位的个人乃融入整个人类社会，由此似乎可以证明，个人乃是衍生物。”

当然，毫不奇怪，在这种相互依存的网络内，最有价值的乃是家庭和国家。

儒家的行政管理制度

H. G. 克里尔在他的《中国人治国之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一书中写道：

“首先，中国模式的管理方法曾经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在一个辽阔的土地上对为数众多的人口进行统治，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曾见过的。公元前1世纪，中华帝国曾统治过比罗马帝国最盛时疆域还大的疆土，并且好几次它统治的范围还更大。没有别的政治体制对如此规模的疆土维持其统治如此之久，2000多年几乎不曾间断，它是靠人治而得以发展的最具活力的政府。”

克里尔并指出，中华帝国的规模及其持久的存在，正如常常所表现的，并不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反映，毋宁说倒有点像是西方世界的政治模式。他指出，在公元前2世纪和1世纪间中国最高爵位的帝王，至少有22%来自贫寒之家；相反，在1789年至1953年，美国最高领导人只有28%来自一般家庭。

公元前 1 世纪，中国的官僚实质上还是通过选举的，根据德才予以晋升，比如文官考试制度的科举和论功行赏的甄别。西方正式的文官考试一般说法是 1693 年在柏林举行的，定期每年举行的官员录用审定制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开始的。

而且，中国很早就有一套通过严密的成文律令和种种正规告示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

使用律令和告示推行行政管理纪律，为中国的人治即德治而不是法治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基础。被委托负责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人员，很早以来就是经过严格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这种教育制度在于培养一个人的自律和知识分子的毅力，掌握高超的学识，纯化人们的道德及精神。

这种律令和告示的使用受到过法家的影响，很明显它是儒学传统的核心，并显示出该传统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以及官吏行使权力时在法令和裁决之间进行判断的艰难。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很早就发展了政府应遵循的十分完善的政治规章，后来积累经验，并向别的优秀文化传统学习，或者如克里尔所说：“在西历纪元开始之前，（中国）理论家就拟定了一套深奥的行政管理原则，这在 20 世纪之前在别处是少见的。”

这样一种庞大的发动人并管理人的机构网络早已存在，那么，在 20 世纪后期，在工业、技术、商业和政治的成功都取决于在庞大的机制中动员、激励和管理人的

能力的时代，那些吸收世界文明营养的人民，他们正有新的作为，这难道会感到奇怪吗？中国人管理人的能力的信心，是世界许多人承认的，人们都认为中国是“中央帝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律令和政府机构组织形式的根源。

第二章

世界的中心：历史面面观

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易经》

朝代的循环轮转

“天命”一词是公元前 1122 年周朝先于孔子时出现的，它是中国朝代循环这一概念的基本。在征服自己的对手后，周朝提出“天命”一说用作宣传手段，对被打败的一派表示，这是天意，应该接受其统治。此后“天命”一说乃成为中国国家形成主要依据的宪法。

孟子是早期儒学传统最有影响的第二号思想家，世称亚圣，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崇奉“天命”之说，实质上是统治者把自己的权力归因于最高的神灵，他是替天行道，造福于人民。如果替天行道失败不能造福人民时，天意就会罢黜他而另找贤主。儒家的导师和思想家利用这一概念警告统治者为贤能让位，以保持皇朝的延续。

愤怒的谴责，以致全面革命爆发，官逼民反，一旦群情激愤到了极点，便产生一种坚强的纪律，并接受“天命”，这不论是秦、汉或其后各朝，都只是中国漫长而无

情的朝代更迭的开始，从这点说，统治者的权力及其所欲是公然被授予的，是君权神授，是必然注定的，无须进行无公正可言的仲裁或政治强制。除某些朝代有明确的立法，很少有人想进行这种强制。

中国人很早就重视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联系，强调什么是一个成功而长命政府的条件。缺乏现代民主政体，统治者便失去想通过良好政府赢得人民支持拥护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古典巨著《孙子兵法》严正地提醒人们，军事上的胜利者并不是最刚健者，真正的刚健者乃是那些掌握孔子人际关系和组织艺术的人。有趣的是，一部现代中文著作《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又提醒人们，过去赢得战争、帝国和“天命”的《孙子兵法》，今天已成为建立大型商业机构、赢得市场和积累巨额资金的指南。

与日本人不同，日本皇帝被认为是从太阳神一脉相承传下来的，而中国人，直到 20 世纪，仍持这样的观点：一个皇帝若其气数将尽，必将在某一时间被取而代之。

许多贤能英才，被皇帝周围的大臣唆使，他们挑拨离间，削弱皇上的权力，设法使实权转移到另外人手中。实际上，中国宫廷政治玩的就是微妙的权力游戏。宫廷的气氛总是同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的，也有个别出身平民的皇帝在登基初期是与民同命的，知道如何履行“天命”。

然而，这种朝代兴替体系却能创造更大意义上的稳定、统一和连续性，这只是中国政治的情况，这几乎在任

何别的地方都是少见的。

这一成功的秘诀可在政府体制中找到，这种体制是围绕皇帝建立起来的，而掌握实权肩负责任的则是其周围的文武百官。这些人，除了在政治腐败时期，都是受杰出的诸子百家学说熏陶、指引和激励的，当然最为明显的乃是孔子的学说。

有一部根据汉朝（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事件写成的家喻户晓的杰出巨著《三国演义》，书中叙述的是在汉朝没落之后三个敌对的王国为建立一个新皇朝而相互争斗的故事。这一故事之所以引人注目，是由于它洞察了中国人政治思想的成熟性、灵活性和创新性，它是一部任何人想要探究其战略和支配中国人生活的思想模式的基本入门读物。如同《孙子兵法》一样，《三国演义》也被用作发展商业管理原则的指南。

纵观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重要的一条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孔子明确指出的，关键问题是人的管理。漫长的有记录的中国历史，甚至在孔子时代之前，就提供了一个了不起的智慧和经验宝库，其中表明中国人民是如何不懈地与困难搏斗的。

佛教的传播

当儒学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宗教教派佛教也在印度兴起。佛教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一位统治者，他要证明自己是印度最杰出的阿育王王子之一，公元前 268 年强